493

在20世纪初叶浮现出的职业历史学中,记忆和历史被理解为是在一前一后地运作着。历史奉献自己作为记忆的官方形式。它声称提供了一种对所记忆过去的严格批判性解释,即通过去除它的浮夸之处与错误概念,给出凝练的集体记忆。它洋洋自得于它的精确性、客观性、公正性和与过去的批判性间距。它确信,通过诉诸方法和证据,人们能够这样宣告。历史学被视为具有极高可靠性,因为它纠正了错误记忆,并由此让人们可以稳妥地去理解过去。在其最佳分析中,披着现代学术外衣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基于可信赖之确定性的观察过去的视角,并因此被当作种特殊的科学。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指出:“记忆是历史的原材料。”历史始于记忆结束之处。历史的权威性,依赖于那种历史主义的命题,即有着一种所有过去经验都赖以存在的深层次暂时性基础。历史的时间轴充当着一种普遍“时间科学”的必要参照系。

494:

在集体记忆之本质与重要意义方面,标志着这种学术立场变化的是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格( Terence Ranger)的《传统的发明》(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1983)。[6]“发明”一词的使用意在挑明记忆的结构性本质。作者们主张,19世纪欧洲政治家对古老传统的诉求,在于那种传统有权力去增进他们的直接政治目标。传统远非单纯重申对一个神圣过去的尊崇,它被加工用来合法化那些民族建构之实践目标。这本书大获成功。在它出版10年之后,兰格指出,在那10年里,它在每一份递交给主要美国社会科学基金会的经费申请书中都被提及了。

“集体记忆”这个术语,在当代学术话语中,包含着不止一种意义。记忆研究的历史编纂学现象,也许可被更好地描述为各种兴趣的一种会聚一一它们来自于不同源泉并以不同模式为基础。作为初始一步,人们必须把情景记忆( episodic memo ry)与语义记忆( semantic memory)区分开来。情景记忆涉及唤醒特定事件;语义记忆处理一般共有的心智习性。但是它们的关系是更加复杂的,因为被频繁记起的情景,常常随着时间的流逝归并成抽象意象。换句话说,情景记忆不知不党地逐渐变成了语义记忆,而在语义记忆中,关于实际经验的记忆被吸纳进了更大的想象性表征( Imaginative representation)领域。以此方式,集体记忆最终与集体心态融为体,这表明了为什么年鉴史家最初被那一主题所吸引。[8]某些学者主张,那些集体意象根本不是记忆,毋宁说是随时间而演化着的那些寻常社会及文化态度的标识这似乎是一种夸张说法,因为个人之生活经验证词始终是集体记忆的深层根源,无论集体记忆的意象随时间推移会变化多少。记忆经验( remembered experience)最终被简化为集体记忆的理想化表征,这一命题始终是记忆之历史研究的一条核心命题。记忆把过去输人到现在情境中,因而过去很容易被重塑以适应现在需要。

——

记忆与新发明的传播技术

496

越来越大的影响,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学术兴趣逐渐被激起了。学者们能够看到, 从原初口头表达文化转至那些手抄本读写文化,是2000年来一系列传播技术革命的第一步,而那一系列革命不断改造着感知效果、记忆运用和知识的组织化。

497:

并不令人吃惊地,这一领域内的研究紧紧围绕着那些在新旧发明的传播方式之间的转折时期:尤其是在古代从口头表达进入手抄本读写的那段时期(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1世纪),和在现代早期从手抄本到印刷文字的那段时期(6世纪到8 世纪)。在每次开端,记忆观念都要被重新阐述。正如帕里和洛德早先已解释的, 每次转变都标志着对各种原初口头表达文化中记忆方式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背离。

499:

印刷文化在近代早期的扩散,是吸引传播技术方面学生的另一处主要场所,印刷文化更加意义重大,因为它标志着在记忆运用方面从耳到眼的决定性转变。那些研究开启了对启蒙运动之本质的一种全新的视角,即把兴趣点从这场思想文艺复兴的启蒙思想家转到飞速扩大的读者精英群体,后者渴望在一种印刷文字使得知识比以往要更易于为公众得到的文化中去消化他们的教海。

印刷读写表达的文化影响显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印刷品把要去被记忆的事实搬至图书和百科全书中,使之比前一时期的手抄本档案要更易于为更多的人获得。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通过让回忆顺利地被对那些知识概述进行私人参阅的方式所取代,人们积极地唤回了公共记忆。罗伯特・达恩顿是最具可读性的印刷文化学者。他的早期学术工作关注于百科全书( Encyclopedie)的产生过程,认为它是在印刷文化这一近代时期的知识组织化与保存的关键工具。[24]但是他的畅销书《屠猫记》( The Great Cat Massacre,1984)博得了更广泛的受众。在一系列巧妙讲述的故事中,他详细审查了那些源自印刷读写表达兴起时代的新社会类型( social types):印刷工、雇佣文人、编辑、书记员和小说读者。

507:

对记忆现象的历史编纂学讨论,不由自主地就凸显了历史解释的记忆性。用记忆研究的用语来说,历史学家以他们书写历史的那种方式把记忆线索提供给他们的读者。历史学家有能力用过去构造出所谓的公共回忆。如果历史学家是公共记忆的卫兵,那么他们也是它的仲裁人。他们不仅裁断要被记忆的过去,而且塑造着过去被呈现的方式。作为最低程度,记忆研究使得某些历史学家建议,通过承认偏见、著述中的精神分析因素和历史表现限度等现实存在,解释问题可以更谦逊地被处理。作为最高程度,那类研究提出了关于历史叙事、历史时间和“过去”经验之表现等更广泛的议题

63

510 时间的记忆术

时。历史被书写,仿佛有着为其最终完成已开辟好道路的一个预期中的过去。在那么一种方案中,现在成为在历史向其终结进军的道路上的一个地点标识。7]用更温和的术语来提出这种论点,即有一种目标导向的历史提示了对源头进行搜寻, 并且把现在变成仅仅是沿着具有一个可预见终点的道路前进的一个阶段。

515

为了解释何者利害攸关,利科一步步地返回至记忆与历史之区别最初从中浮现出来的那些原始深渊。在口头表达给读写表达让渡出一个场所的起点上,他确定了各种路径的分界点。他把他的分析莫基于那第一次从哲学上讨论读写对于记忆之运用所具有的多重意涵的作品: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录《斐德罗篇》(约公元前370年)。它是最古老的对记忆与历史之关系这个迷团的反思,系在一场关于书写对人类想象之影响的对话中展开表述。苏格拉底提出这一问题:书写作为记忆的一个帮手,是一种救助还是一种毒害?他的回答不在于选择此或彼,而在于思考一种新传播技术的发明如何改变了我们对记忆资源的理解。利科解释道,历史也许可被算在第一批记忆艺术中。它迅速拥有了过去,即以其保存模式拥有着记忆。

因而,历史也许可被视作一种纪念。它是我们最广为人知的通向一种对过去的批判性理解的道路,但却是以给我们所应记住什么或如何记住设下决定性限定条件为代价。相反,以其想象模式出现的记忆,必定被作为一种不受约東的心灵力量而得到珍视。在其启发下,新的开端得到鼓励。正如利科指出,它是“一个小小奇迹”( a little miracle),就它有能力进行创造性更新而言,它超越了历史。在承认它忠实地记住了脱离过去的种种不人道行为一原谅了但至今始终未停止关心一一记忆也许会与最荒芜的历史现实达成和解。在此,记忆由于历史记录而活起来了,一种维系着我们救赎错误过去之希望的资源。[87]